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
第二学士学位应更加开放

■本报记者 温才妃

近日，郑州一所职业院校多年招收本科毕业生“回炉再造”的消息，在招生季意外走红，“本升专”迅速登上热搜。实际上，“本升专”本质上类似第二学士学位，即学生本科毕业后再修一组课程，以满足就业需求。

作为国内一直推动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专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不久前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反映，许多“双一流”高校第二学士学位几乎都不对外招生，或只面向本省高校毕业生招生，希望第二学士学位面向其他高校开放，给普通高校毕业生更多学习机会。

两种选择都与第二学士学位紧密关联。第二学士学位是否应该更加开放？这种开放在当下又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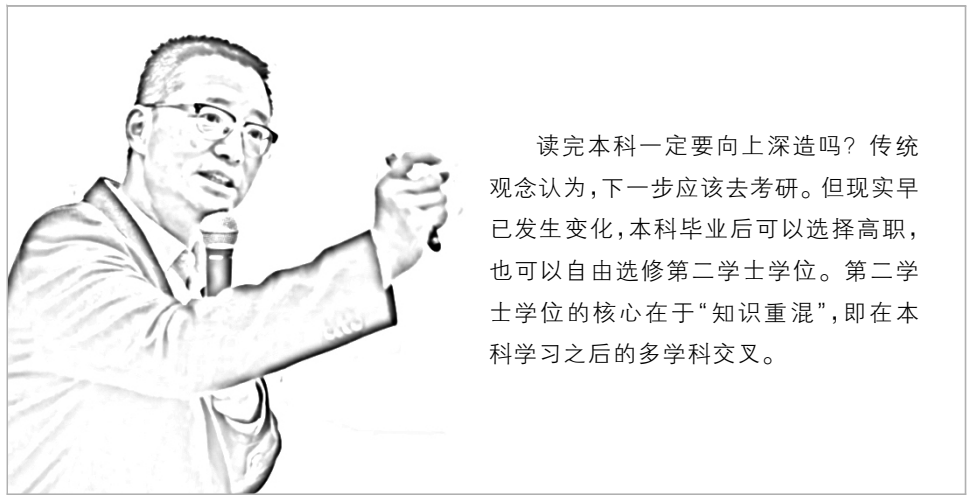
鲁迅也是“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中国科学报》：第二学士学位在国内已开设多年，2019 年后经历了“差点停招”到“扩招”，但不少读者还是比较陌生。你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它的基本情况？

卢晓东：第二学士学位是本科毕业获得第一个学士学位后，学生学习另外一种本科专业的教育制度。目前国内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基本政策是，面向本科毕业 3 年内的社会人士招生，学制 2 年。学生无须再学习英语、政治、通识课等课程模块，只需要学习 60~70 学分专业课。与微专业等相比，第二学士学位有正式学籍，涉及户籍迁移，学分体量达到主修专业的一半，高于微专业的学分要求。与辅修、双学位不同，它属于“本科后教育”。

第二学士学位的核心在于“知识重混”，即在本科学习之后的多学科交叉。例如，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 1955 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59 年进入“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西学中班）”脱产学习两年半。两段学习后，屠呦呦的知识结构兼具中医和西医领域。她通过第二学士学位的实质学习成长为跨学科创造性人才。鲁迅也是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他在日本仙台医专的第二学士学位学习过程中的退学、转向和反思被记录在《藤野先生》一文中。

世界范围内，通过这种教育路径成长起来的大家还有很多，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德布罗意、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莱格特、日本第一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小平邦



彦等。“知识重混”有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在教育强国战略目标下，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中国科学报》：你怎么看待热议的“本升专”？

卢晓东：读完本科一定要向上深造吗？传统观念认为，下一步应该去考研。但现实早已发生变化，本科毕业后可以选择高职，也可以自由选修第二学士学位。

从时间维度看，学生大一时发现不喜欢本专业，可以退学重新参加高考，也可以转专业。学生大三期末或大四才发现不喜欢本专业，再转专业已不现实。怎么保证学完本专业之后，学生有机会去学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就是与这一时间相匹配的教育制度设计。

从空间维度看，转换学习地点对人的自我发现意义重大。上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爱德文·哈勃的第一个学士学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专业是物理（+ 数学）。他毕业后在罗德奖学金资助下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是法律，那时他在父亲影响下想做一名律师。通过第二学士学位的学习比较，结合中学教师的工作经历，他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终极梦想——天文学。

向社会开放难在哪里

《中国科学报》：长期以来，大多数高校的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对象仅限本校或本地学生。为什么向社会开放如此困难？

卢晓东：这一问题的确存在。目前，面向社会和其他高校开放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的高校很少，高校普遍缺乏开放动力。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相关教育政策还需要持续调整。

当下，第二学士学位办学和教育政策须处理好以下问题：

高校是否单独开设教学班级？

一些高校认为，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必须达到计划人数，如 60 人才开班，否则 would 提高办学成本。实际上，所有高校的主修专业都可以开设第二学士学位，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报名，也可直接加入统招本科班学习，以学分制选修课程，不需要增配师资、教室。这种安排利用了现有本科课程边际成本为零的优势。例如，贵州师范大学曾经的第二学士学位招生中，“教育学”专业只招收 2 人，就是利用了不另开班的模式，提升了学校整体办学的规模效益。

学生被第二学士学位录取，但并不报到注册，如何处理？

有的学生一边准备考研，一边申请第二学士学位，一旦考研成功或找到工作便放弃报到。高校为此需要承担额外管理成本。这一点需要政策予以特别支持。我建议向日本高校学习，设立第二学士学位定位费。学生考上第二学士学位，就要提前缴纳第一年学费。如果学生未报到注册，这笔钱就转为捐赠款，视为捐赠给所录取的大学。

是否应该收考试费？

本校学生报考第二学士学位，一般可通过本校成绩单掌握学情，审核成本较低。

外校学生报考需要参加考试，考核成本相对较高。如果需要高校额外补贴考试成本，高校自然就没有对外开放招生的动力。为此，政策上应予以特别支持。这也就意味着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开放招生，要收取符合市场价格的考试费。

是否提供宿舍？

当前大多数高校为第二学士学位学生提供宿舍，收费与统招生一致。由于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已在第一次读本科期间享受过国家财政补贴，且高校宿舍普遍紧张，因此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开放招生，意味着高校将逐渐过渡到不向第二学士学位学生提供宿舍。

吸引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举措

《中国科学报》：如果第二学士学位向社会开放，会为地方带来哪些益处？

卢晓东：它可作为地方引才的重要手段。一些地区可以鼓励本地高校面向外校招收第二学士学位学生。比如，湖南一直在努力吸引高校毕业生创业，为此应该鼓励省内优秀高校如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更多开放招收其他省份的学生，经由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把其他省份的本科毕业生吸引过去，从而把优秀的学生留在湖南创业。

《中国科学报》：学生本科读的是普通高校，但第二学士学位毕业于“双一流”高校，用人单位究竟该如何认定这名学生的学历，是普通高校还是“双一流”高校？

卢晓东：用人单位可以自行判定。比如，一名学生在普通院校毕业时的绩点是 3.1，在“双一流”高校读第二学士学位以 3.8 的绩点毕业，可以认定他是“双一流”高校毕业生。

学业评价不光要换算成 4 年绩点，还要看各学期成绩变化折线图。一名学生第一学期的绩点是 2.0，毕业时的绩点是 3.3；另一名学生第一学期的绩点是 3.8，毕业时的绩点是 3.3。显然，前者的学习能力更强。学生可以提供各学期绩点折线图，供用人单位参考。

《中国科学报》：目前政策仅允许毕业三年内报考。不少人因超期被排除在外。未来是否可能放宽这一时间限制？

卢晓东：目前政策仅允许本科毕业 3 年内报考。各项政策如果到位，未来学生报考时间应该放宽到本科毕业 10 年以内。



刘贤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最近，多所“双一流”高校相继宣布取消或压缩学术型硕士（以下简称学硕）研究生招生规模，转而扩大博士生，特别是“直博生”的录取。这一变化在基础学科尤为明显。

例如，复旦物理学系日前宣布 2026 年起不再招收普通学硕研究生。此前，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内头部高校也陆续调整相关招生政策。这引发了公众关于“读研机会减少”“学术硕士退场”的讨论。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 2010 年招收硕士生 47.44 万人，招收博士生 6.38 万人；而 2022 年全国共招收硕士生 110.35 万人，招收博士生 13.9 万人。为响应高层次人才战略，2020 年召开的研究生教育会议就已提出，未来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主要通过博士教育培养，硕士阶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即以专业学位硕士培养为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 年）》更是直接明确要将专业硕士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招生总规模的 2/3 左右。

在具体实践中，该政策导向被迅速放大。目前，国内高校和学界都普遍将学硕的价值视为本科学位与博士学位之间的过渡性学位；专业硕士则成为了就业导向型的主要载体。从招生端口看，很多高校对学硕采取压缩甚至取消的策略，使“博士化”趋势愈发凸显。

在这一趋势下，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成为实行“直博化”的重点对象。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些领域的科研门槛要求高、人才储备周期长、就业路径相对较窄，“直博”有助于提早锁定科研苗子和“潜力股”。

然而，这一趋势也带来不少问题。博士阶段对学生的学术动机与研究能力要求极高，未经历硕士阶段的训练与过渡，不少学生可能难以适应高强度的科研挑战。一旦改博的退出机制不完善，学生很可能面临学业断档甚至就业困境。此外，硕士生科研团队中长期扮演“中坚力量”角色，若完全以直博生替代，可能导致科研梯队结构的失衡。

总之，基础学科改革应坚持“优中选优”，而非“一刀切”。直接采取取消学硕的办法并不等于培养质量的提升，资源过度集中于直博生反而可能压缩教育的多样性与弹性。

在笔者看来，学硕压缩已直接改变了学生的深造路径。

其一，随着推免直博成为主流，本科“出身”在选拔中愈加重要。“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在推免体系中具有天然优势，“双非”高校的优秀生则更难获得“逆袭”机会。

其二，作为应用学科的重要“人才蓄水池”，基础学科一旦全面转为直博培养，便失去了学硕这一关键“过渡层”，学生的选择面将严重受限。

其三，尽管专硕定位于“就业导向”，但现实中用人单位对专硕的认可度仍存在分化。部分学生为避开“专硕偏见”，仍倾向于报考学硕。但当学硕研究生被大幅压缩、专硕尚未全面获得信任，学生可能在升学与就业之间陷入两难。

此外，“博士扩招”并不意味着教学科研岗位的同步增加。数据显示，我国高校教师岗位和科研机构博士后名额的扩展速度远低于博士生增长速度。近年来，博士“高学历就业难”的现象愈发突出。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北京理工科年博士毕业生数量保持在全国 1/4 以上，且在过去 10 年保持年均 5.4% 的增速。早在 2021 年，北京高校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就已经超过了 1 万人。

相比之下，北京高校理工科专任教师总数一直稳定在 2.9 万人左右，甚至在某些年份还出现了下降现象。对人才个体和整个科研系统而言，这种“学历通胀”的代价不容小觑。

必须承认，推动研究生教育分类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操作层面应避免“唯政策指标”导向。

一是要为基础学科保留一定规模的学硕入口，以形成灵活的人才梯队和人才储备。要知道，学硕不仅是科研的衔接带，也是科研兴趣未明的学生的重要缓冲阶段。

二是要为直博设立明确的退出机制与评估节点。例如，对中期考核或资格考试不达标的博士生，可授予硕士学位并让其退出博士培养，而非硬性推进。

三是要在直博招生中提高校外学生占比，确保不同高校背景的优秀学生能在同一平台公平竞争，并进一步通过改革统考选拔方式，给予非“双一流”本科生一定的补充通道。

四是控制博士扩招节奏，促进结构匹配。博士扩招不能脱离国家科研与产业结构需求，应同步扩展高质量科研岗位与多元就业通道。

总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目标是既能拔尖造峰，也要固本厚基，其相关改革要有冷静、理性的边界控制，教育改革和培养单位的具体操作不应在热潮中迷失方向。在某些学科或高校，停招学硕、扩招博士的举措是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但如果演变为一场没有边界的“政策竞赛”，很可能带来一系列次生问题。在分类培养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制度设计的精细与以人为本逻辑的坚守。

研究生教育的结构调整是否走得太快

优质本科扩容不是“拼指标”而是“提质量”

■夏晓燕

2025 年春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迎来一项标志性改革举措——优质本科扩容全面启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积极响应中央部署，纷纷宣布新增本科招生计划。2025 年扩容总规模预计超过 2 万个名额，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国家急需领域。

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招生规模扩张，更是一项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推动教育公平提升的系统性改革工程，标志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在优化高等教育供给结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这批本科新生将步入大学校园，成为国家教育结构转型的第一线“实践者”，也将承担起推动未来人才体系升级的重要使命。

破解高层次人才结构性短缺

优质本科扩容的核心使命，在于破解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存在的结构性瓶颈。

2025 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 1335 万，虽较 2024 年略降 7 万，但仍处于历史高位；与此同时，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预计达 1222 万人，再创新高，释放出“提质扩容”的双重压力。

此次扩容并非“摊大饼”，而是通过精准增加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的高质量学位供给，优化优质教育资源的结构并提高配置效率，推动人才供给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动态匹配。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立国曾提出“双一流”发展新目标——“两个 20%”，即“双一流”高校在校生与招生数各占全国普通本科的 20%，并力争到 2035 年整体培养规模实现翻番。这一目标不仅回应了扩容背景下的资源集中趋势，也为构建高质量人才供给体系描绘出清晰路径。

“扩的是优质、提的是效能”

在优质本科扩容政策引导下，各高校正依托自身优势，协同推进招生扩容、育人

模式革新与学科结构优化，努力实现“扩的是优质、提的是效能”。

清华大学新设通识书院，打造“AI+ 多学科”培养范式；上海交通大学新增 150 个招生名额，聚焦人工智能与新能源方向，并联合华为共建“鸿蒙生态学院”，推动课程体系与产业前沿技术“零距离”融合；武汉大学依托北斗卫星科研优势，开设空天信息专业，精准瞄准国家空天科技人才缺口；中山大学将招生规模增至 7845 人，着重发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兴交叉学科；中国人民大学适度扩招逾百人，强化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兰州大学新增 350 个计划名额，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重点投向计算机、电子信息、核工程、草业科学等“硬核理工”与传统优势学科；郑

州大学扩招 150 人，同时优化专业结构，停招 10 个不匹配专业，将新增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信息安全、自动化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

与此同时，文科高校积极推进“新文科”转型。北京外国语大学推出“英语 + 法学”“西班牙语 + 国际新闻传播”等数字化、本土化交叉项目，推动传统文科精准对接国家治理与文化传播需求；复旦大学设立 100 余个学科、跨学科、创新创业微专业和课程与 54 个双学位项目，涵盖国家重点急需方向，推动文科跨界融合、重构内生动能。

校企联合、定制化人才培养模式亦成为扩容背景下的新亮点。华北电力大学与

国家电网共建“特高压直流定向就业班”，计划招生 60 人，面向重点地区定向选拔，实现“入学即上岗”，为国家能源战略培养急需人才。

扩容成效的根基在“育人”

人才培养质量是优质本科扩容的“生命线”与“压舱石”。扩招提速的同时，如何筑牢质量保障体系，确保“扩的是优质、增的是实效”，成为各高校面临的核心命题。

多所“双一流”高校正在通过育人机制重构、学业支持升级、评价导向转型等为扩容保驾护航。清华大学依托通识书院；中山大学实施本研贯通课程；北京大学借力元培学院的交叉平台，着力打造高效率、高融合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北京师范大学构建“学业预警系统”，以大数据实时监测学生学情，实现“早发现、早干预”；华中科技大学推行“跨学科导师制”，整合全校师资，为每位学生，特别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群体提供个性化支持与职业发展指导。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表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资源获取与路径选择上更易陷入劣势。因此，建立精准、持续的支持体系，是扩容背景下“提质育人”的关键抓手。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正从“学分本位”向“能力导向”深度转型。以 2025 年新设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职教赛

未来社会更看重“真能力”“真问题”。批判性思维、跨界整合、项目经验与团队协作，正成为高素质人才的“通用标签”。在优质本科扩容的背景下，唯有理性选择与持续成长并重，方能真正把握新时代教育变革的红利，将一次“入学机会”转化为终身“发展势能”。